DOI：10.16339/j.cnki.hdxbskb.2025.03.017

框架悬置：传播场景中的邀请修辞及其叙事观念*

刘涛
（暨南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

［摘　要］邀请修辞的出场目的是克服传统修辞观念中的“劝服”模式，以创设一种平等的交流关系，使得接受者能够自由且自主地建构意义，尤其是实现与修辞者的共同理解。在文本实践中，传统修辞学之“劝服”功能得以实现的主要符号实践是框架装置的生产，即修辞者的叙事意图被悄无声息地植入文本内部，形成一定的框架装置，以此激活并引导接受者的认知框架。因此，为解决邀请修辞在传播场景中的“落地”问题，一种行之有效的修辞路径便是框架悬置，即将修辞框架从文本叙事中剥离出去，代之以事实框架的生产实践，以形成一个事实的而非话语的、自然的而非修饰的、即兴的而非预置的现实呈现模式。框架悬置的叙事策略主要有二：一是框架干预，即基于零度叙事理念，控制主体意图在文本中的暴力入侵；二是框架整合，即基于开放叙事理念，对作者意图和受众意图加以统合，创设一个开放的、对话的文本语义和实践空间。在具体的邀请修辞实践中，框架悬置需要同步考虑框架透明性问题。

［关键词］邀请修辞；框架装置；框架悬置；零度叙事；框架整合；框架透明性
［中图分类号］G05；H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25)03-0138-13

Framing Suspension：Invitational Rhetoric and Its Narrative Approach in Communication

LIU Tao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Jina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632，China)

Abstract：The purpose of invitational rhetoric is to overcome the “persuasion” mode in traditional rhetoric，so as to create an equal communication relationship，so that the recipient can freely and autonomously construct meaning，especially achieve a common understanding with the rhetor. In text practice，the main semiotic practice realize the “persuasion” function of traditional rhetoric is the production of framing devices，that is，the narrative intention of the rhetor is implanted into the text to form a certain framing device，so as to activate and guide the cognitive framing of the recipient. Therefore，in order to apply invitational rhetoric to the communication context，an effective rhetorical method is to create framing suspension，that is，to strip the rhetoric framing from the text narrative and replace it with the production practice of the factual framing to form a factual rather than discursive，natural rather than modified，improvisational rather than preset reality presentation mode. There are two narrative strategies for framing suspension：one is framing intervention，that is，based on narrative degree zero to control the invasion of the rhetor’s intention in the text；the other is framing integration，that is，based on open narratives to integrate the author’s intention and the audience’s intention to create an open and dialogical text semantics and practice space. In specific invitational rhetoric practices，framing suspension must simultaneously ad-

* ［收稿日期］2025－01－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专项：传播研究的修辞学范式及其创新研究（22VRC158）
［作者简介］刘涛（1981—），男，甘肃庆阳人，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视觉修辞学、融合新闻学。

dress the issue of framing transparency.

Key words：invitational rhetoric；framing device；framing suspension；narrative degree zero；framing integration；framing transparency

修辞学诞生于公共演讲、法庭抗辩、道德教育等社会实践场景，因此其携带着挥之不去的实践基因，即致力于嵌入社会实践场景，通过“言语行动”（speech act）来影响和改变社会。从修辞思想史来看，修辞学被视为一种实践的科学[1]，属于实用科学（instrumental discipline）的范畴[2]。这决定了修辞学的使命便是以符号实践为工具，影响他人的感知、观点和行为。而修辞学与传播学的相遇，催生了一个新兴的学科领域，即传播修辞学[3]。詹姆斯·C 麦克罗斯基（James C McCroskey）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以修辞为方法的传播实践创新，提出了“修辞传播”的概念。按照麦克罗斯基的观点，一个理想的传播活动设计，必须诉诸一定的修辞术，如此方能实现对传播效果的有效控制，即传播者的意图在接受者那里得到准确的还原与理解。麦克罗斯基甚至将修辞传播视为一种理想的传播实践，认为修辞技能乃是一种普遍的社会交往素养[4]19。

传统修辞学的本质基因是“劝服”（persuasion），其目的是将修辞者的意图悄无声息地“施加”在接受者那里，以影响或改变接受者的认知和观念，只不过这一过程需要诉诸一定的修辞术。为了超越传统修辞学的“劝服”模式，克服其中的霸权逻辑和修辞暴力，以创设一种平等的、自由的、对话的修辞关系，索尼娅·K 福斯（Sonja K Foss）和辛迪·L 格里芬（Cindy L Griffin）于 1995 年系统提出邀请修辞（invitational rhetoric）这一全新的修辞理论。邀请修辞以“邀请”（invitation）为核心概念，以平等（equality）、内在价值（immanent value）和自我决定（self-determination）为修辞价值，旨在通过“邀请”而非“劝服”的方式，促进修辞者与接受者之间的共同理解和自由对话[5]。对于传播修辞学而言，邀请修辞无疑意味着一种亟待探索和挖掘的理论话语，其有助于超越修辞传播的控制模式，构建一种全新的传播观念、交往关系和叙事体系[6]。然而，邀请修辞之观念自诞生以来，在传播场景中面临的最大困境便是“落地”问题，即如何实现“邀请”以构建一个理想的“邀请世界”。

一　框架之殇：邀请修辞中的框架问题

在文本的意义实践中，无论是编码维度的意义组织，还是解码维度的认知模式，都涉及意义何以编织与解读的框架（framing）问题——编码维度对应文本框架，解码维度对应认知框架。所谓框架，即是一种语义结构或认知模式，它寄居在文本内部，潜藏于大脑深处，悄无声息地影响着意义的组织模式及“展开”方式。文本框架和认知框架的关系可以简单概括为：一方面，文本框架限定或引导认知框架——接受者调用何种认知模式，依赖于文本的编码方式；另一方面，认知框架是文本框架的显现与映射——文本框架体现为一套复杂的语义关系，其往往处于不可见的状态，唯有诉诸一定的认知模型才能加以拆解和识别，以此洞悉文本内部的语言游戏。

框架恰恰揭示了意义被编码、封装、组织的内在规则，也揭示了人类加工信息的运行法则和机制，即“框架依赖”。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将框架视为一种阐释图式（schemata of interpretation）——人们如何辨别、感知、确认、命名事物，本质上依赖于一套认知模式[7]21。乔治·莱考夫（George Lakoff）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出发，对框架给出如下描述：“框架，是你看不见也听不到的东西。它们属于认知科学家称为‘认知无意识’（cognitive unconscious）的环节，是我们大脑里无法有意识访问、只能根据其结果（推理方式和常识）来认识的结构。”[8]1 因此，框架设定了思维活动所依赖的认知基模、参照体系、区分法则和推演路径。

作为文本语义系统中的符号装置（symbolic devices）之一，框架发挥着区别于其他意义装置的特殊功能，其不仅作用于意义的形成过程，而且积极作用于接受者的认同建构过程。威廉·A 甘姆森（William A Gamson）等提出“框架装置”（framing device）的概念，用以阐明人类的认识活动深深地受制于框架的影响和塑造[9]。源于框架装置的作用，一系列携带着修辞意图的框架被生产出来，其结果便是媒介景观中的“现实”逐渐脱离了事实的维度，而成为话语的构造物。在媒介叙事体系中，大众媒介之话语操作的结果便是通过对某种框架的征用，影响公众的认知和判断，从而塑造公共舆论[10]。

由于框架深刻地影响着文本的解读方式，且携带着明显的修辞意图，因此框架之于邀请修辞而言是一个极为暧昧的事物——认识活动离不开框架，

但又深陷于框架之中,承受着不可避免的“框架之殇”。一方面,框架是文本挥之不去的“幽灵”,文本编码活动必然伴随着框架的生产。在文本形成的一瞬间,框架便寄居其中,但此时的框架是沉默的,是匿名的,它潜藏在文本的深层结构中,等待意识的召唤与认领——经由思维活动的打量与开掘,框架便从沉睡中苏醒过来,显现在大脑之中,为文本意义的解读提供阐释依据和方向。另一方面,框架又是叙事者精心植入文本之中的“幽灵”,它看似一个无名之“物”,实则携带着叙事者的主观意图——作为一种符号装置,框架将主体意志隐含其中,使其呈现出一种不可见的匿名状态。那些看似未经雕饰的文本内容,实则如同牵线木偶,接受框架的驱动和牵引,并按照框架所设定的游戏规则尽情地展演,从而将躲在暗处的主体意志合法化与正当化。由此可见,框架中潜藏的劝说欲望,恰恰是邀请修辞竭力回避的对象——框架如同横在发送者与接受者之间的隐形壁垒,制造了二者之间的不平等关系。这是因为框架并非中立的符号装置,而是牢牢地掌控在发送者手中,发送者在文本编码过程中便已经悄然植入了既定的框架形式。接受者从框架中“发掘”的现实,往往是发送者悄然“投喂”的结果。不难发现,尽管邀请修辞的初衷是创设一种平等的接受关系,但框架似乎并不对此负责,它更多地受控于传播链条中的发送端,服务于发送者的主体意志——尤其是当框架的“编织”手法更加隐蔽时,其势必制造出某种不可见的话语霸权。

不难发现,框架之于接受者的意义在于提供了一种有“章”可循的信息处理模式,而之于文本的意义便在于预设了某种潜在的立场、观点甚至价值判断。当主体意志借助框架悄无声息地“传导”至接受者这里时,邀请修辞便不得不正视框架问题。为了实现邀请修辞所期待的自由认知、平等关系、共同理解等传播目的,文本叙事首先需要面对并处理无处不在却又形迹难辨的“框架”这一符号装置命题。框架不仅携带着主体意志,而且将主体意图进行伪装处理,这使得传播活动中的劝说过程变得更加隐蔽。

因此,邀请修辞的基本“邀请”理念便是悬置框架。框架悬置的价值基础是承认差异性和多元性,实现修辞者与受众之间的权力共享(power-with)而非权力控制(power-over)[11]10-17,同时尊重受众的自由认知权力,以聆听而非劝说的方式塑造一个共同的社会愿景[12],这决定了框架悬置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唯有对促进劝服行为发生的修辞装置——框架进行拆解和反击,才能真正回答框架的悬置方法命题。相应地,框架悬置的基本思路便是立足框架生成的反向思维,拆解框架形成的链条和环节,以避免基于框架的霸权话语生产。必须承认,框架形成的因素较为复杂,“施加”在文本上的话语“压力”也较为多元,除了主体意图在文本编码过程中的悄然潜入,一系列外部因素也往往间接地作用于框架的生成过程。迪特勒姆·A 舍费尔(Dietram A Scheufele)研究发现,在大众媒介的话语实践中,诸如社会伦理与价值、机构压力与限制、利益群体的压力、新闻行业的惯例、记者的政治倾向等外部因素都会影响媒介报道的话语框架[13]。外部因素更多地指向文本存在的外部环境和条件,其不可避免地笼罩在文本的上空,铺设了文本存在和出场的底层逻辑。由于外部因素及其诱发的框架逻辑往往难以被改变,因此,一种行之有效的框架悬置思路便是在对外部因素进行综合考量的前提下,主要从文本编码与生产维度切入,探讨框架悬置的可能方法与路径。

考虑到修辞学主要在文本和文本实践维度思考问题,因此邀请修辞的框架悬置主要发生在文本维度,即在文本编码中最大限度地悬置框架,以防接受者被动地进入框架所预设的认知“轨道”,从而赋予接受者的认识活动以主体性和自由性。然而,“悬置”并非易事,框架悬置的复杂性恰恰源于这样一个悖论:人类的认识活动离不开框架,完全拒绝框架是不可能的,亦是不现实的。具体而言,框架之“幽灵”弥散在文本之中,不仅构成了文本之元形式,而且是认识活动不可或缺的认知模型。正是在框架所铺设的模式化认知结构中,人们得以建立意义之结构与图式。倘若完全抛弃框架,认识活动又会陷入不安与迷茫之中——放弃框架,意味着放弃了认知的基模、判断的坐标、论证的方向,意义也就失去了某种规约的逻辑和结构,难以进入一种共享的阐释社群,亦难以成就更广泛的社会对话与交往。

因此,框架悬置并非意味着对框架的绝对悬置,而是类似于现象学的还原方法,将主体的预设立场、先在意图、刻板印象都“置入括号”,使其处于一种“存而不论”的状态,以此避免主体的立场、观点、价值判断潜入框架之中,“以框架的方式”影响接受者的认知过程和现实建构。诚然,正如鱼和水的关系一样,我们不能抛开水来谈论鱼的生存技能问题。由于框架已然成为文本的一部分,亦成为认识活动的一部分,因此,本文所说的框架悬置,并非将框架从文本编码系统中完全“剥离”出去——没有框架的

文本,注定会陷入语义的混乱与无序,也势必影响接受者的意义感知和建构过程。本文认为有必要对文本框架进行区分,如此才能确立悬置的对象,进而以悬置为方法,使得邀请修辞真正落到实处。为此,本文使用“修辞框架”(rhetorical framing)这一概念,以区别于那些悬置了劝说性意图的基础框架形式。相应地,邀请修辞需要面对并处理的框架悬置问题,实际上是指对“修辞框架”的悬置。

那么,什么是修辞框架? 如何对其进行悬置? 悬置又何以实现“邀请”之目的? 唯有清晰地回答这些问题,才能真正解决邀请修辞所面临的“框架之殇”。所谓修辞框架,意为经由修辞装置(rhetorical devices)建构的框架形态。倘若一种框架呈现的是一种封闭的认知逻辑,制造的是一种片面的劝说模式,激活的是一种单向的认知轨道,携带的是一种隐性的话语形式,那么其便意味着一种修辞框架。作为一种被激活、被征用的认知模式,修辞框架不仅是意义的“居所”,而且限定了意义的解读方式。修辞框架的符号建构可以发生在语言维度,也可以发生在视觉维度,前者对应的是语言框架的生产实践,后者则指向视觉框架(visual framing)的建构过程[14]279-294。因此,本文以框架为问题锚点,尝试从框架问题切入,探讨邀请修辞的“邀请”理念与策略。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如同其他的修辞形式一样,邀请修辞的主要作用“场景”是文本,基于此,本文主要立足文本的叙事实践,从叙事维度探讨框架悬置的理念和方法,以期构建框架悬置的“叙事方案”。

二　回到事实:作为修辞论证的事实

如何悬置文本深处的修辞框架,破除笼罩在文本上空的话语“枷锁”,赋予文本一个自由的认识天地,无疑是邀请修辞亟待回答的一个修辞命题。任何一种修辞形式必然携带着一定的修辞目的,即通过诉诸一定的叙事及符号策略,实现既定的修辞效果。邀请修辞亦是如此,只不过修辞目的从劝说转向对话——对话的实现,并非依赖于某种引导性的框架装置,而是建立在受众的自由认知和平等交流基础之上。

受众如何从框架的“束缚”中挣脱出来,回到一种自由的认知状态,拥有一种平等的对话模式? 这一问题涉及框架维度的现实建构。区别于其他的修辞行为,修辞框架的意义落点往往是话语,是观念,是合法性,其功能为编织一定的话语形式,以话语的方式完成对现实的合法化建构[15]。因此,当一种修辞框架被生产出来并发挥作用时,现实便经由框架的过滤与架构,被迫进入话语的“管道”,成为话语的操控对象,最终呈现的是一种话语建构的现实。从这个意义上讲,修辞框架的生产往往伴随着对事实的悬置,以及对现实的再生产。这一过程是通过对现实的遮蔽实现的——框架如同一面滤镜,将现实中的事实剥离在框架之外,留下一个被修辞雕饰、被话语接管的现实。

不难发现,框架生产与事实悬置是同步行进的符号实践。框架与事实,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彼此之间可谓是爱恨交织——框架因对事实的遮蔽而成为框架,事实因摆脱框架的束缚而成为事实。在修辞实践中,框架出场的直接后果便是事实的离场,而事实的离场也必然伴随着现实的重构——现实是如此的暧昧而微妙,它游走于事实和框架之间,一方面扎根于事实,向上生长,以“看上去如此”的方式作用于人们的认同体系;另一方面又承受着框架的束缚与规训,在修辞与话语的作用下舞动着身姿,变成了话语期待的模样。按照新修辞学的幻想主题(fantasy theme)理论,现实以何种方式进入人们的认知视野,取决于笼罩在现实之上的修辞视野(rhetorical vision)。正是在修辞视野之中,现实经由修辞的雕刻被塑造为现实,并实现了群体的象征性趋同(symbolic convergence)[16]。因此,修辞实践中的现实,往往呈现出两副面孔——既可以是事实组装的现实,也可以是话语生产的现实。尽管二者之间并不存在严格的界线,且往往呈现出一种杂糅的状态和结构,但不可否认,现实一旦被挤压到框架的管道中,成为话语的“猎物”,它便与事实渐行渐远。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修辞框架对事实的态度是拒绝的、漠视的;相反,修辞实践往往会巧妙地选择、征用、凸显事实,甚至频频以事实的“模样”出场,以建构一个合法的现实。即便是以事实为生命的新闻报道,也往往存在不可避免的框架偏见(framing bias)[17]。其实,新闻媒介之所以意味着一种权力主体,原因在于其发挥着积极的媒介效果,而新闻框架(news framing)以及框架基础上的现实建构,恰恰是媒介权力施展的重要依据[13]。正是在新闻框架的隐性作用下,大众媒介在事实的根基上,建造了一座近乎逼真的“幻城”。因此,事实在邀请修辞中的存在及叙事方式,主要体现为事实以何种方式出场,以何种方式参与叙事,以及以何种方式创造一种“邀请的意义”。

因此,在邀请修辞实践中,框架悬置的有效路径便是复活事实,将框架从现实中抽离出去,使其进入现象学意义上的“括弧之外”,以此赋予现实一种自然的而非修饰的、事实的而非话语的、即兴的而非预置的呈现模式。那么,邀请修辞所倚重的事实,如何才能摆脱框架的支配,走出劝服的命运,并成为一种对话的媒介?要回答这一问题,需要回到修辞学的知识脉络,厘清事实呈现与自由认知之间的学理关系,并进一步思考事实在修辞学中的修辞“位置”,尤其是事实之于修辞论证的作用机制,如此才能超越传统的修辞论证模式,想象并形成邀请修辞得以实现的“事实方案”。

(一)事实:认知与推演

区别于其他的信息形态,事实是对现实的客观反映,其在认知活动中的功能和意义尤为重要。例如,新闻活动中的事实,既是新闻叙事的意义落点,也是新闻论证的前提和条件,亦是新闻认知的逻辑基础——新闻认识活动往往体现为从一个事实抵达另一个事实,在一个事实基础上推演并形成另一个事实。换言之,任何对事实的挖掘与理解,必然体现为基于事实的现实认识与判断行为。如果说故事、情节、戏剧性大多是叙事者的一种修辞操作,其旨在建立一种引导性的论证和推演逻辑,使得受众在预先铺设的认知“管道”中获取某种授权的意义,那么,基于事实的叙事活动及其论证过程则最大限度地限制了修辞者的发挥空间,也限制了主观意志的过度介入,从而赋予受众的认知活动以极大的自由性。这种自由性主要体现在两个认识维度上。

一是基于自身经验的事实认知,即人们可以根据自身的经验系统进行判断,以形成属于自我的认知和判断。那些后殖民视角下的文本叙事,之所以偏离了邀请修辞的逻辑框架,是因为其呈现的故事超出了“地方”的感知范畴,也超出了“沉默者”的经验系统,难以在所谓的“他者”那里被同化——这些故事最终成为一种修辞资源,服务于霸权话语的合法性叙事。例如,在美国西部片的模式化叙事系统中,殖民话语已然嵌入故事的深层结构,印第安人显然无法在自身的生活经验中同化电影中的故事与情节,如《关山飞渡》中印第安人的出场,不过是对白人英雄形象的简单注脚。由于背离了历史与经验系统中的事实基础,这里只有美国白人的“独唱”,而看不到邀请修辞所呼唤的“和声”。尽管20世纪90年代的电影《与狼共舞》对西部片擅长的殖民视角加以反思,尝试矫正印第安人在美国叙事中的刻板印象,但其依旧未能完全赋予印第安人的主体地位,最终演绎的族群之间的“和解”不过是霸权话语在当代的自我调适与修复。因此,一种故事远离了接受者的经验系统时,其便更多地意味着一种劝说框架,限制了接受者的自由认知能力和空间。

二是基于事实的逻辑推演,即立足事实所设定的认知模式,实现认知活动中的论证自由。事实不仅意味着一种认知图景,还意味着一种认知框架,其功能在于帮助人们以事实为认知基础,建立一套关于现实的定义和理解模式。如果说修辞框架是劝说的产物,事实框架则意味着一种通约“语言”——事实在不同主体之间流动,有助于构建一种共通的、趋同的群体意识。事实提供了一种直观的现实认知方式,“从事实到事实”的认识活动往往遵循的是普遍的加工模式,依赖的是共享的论证逻辑,形成的是共通的意义系统。如果说观点和话语的背后往往潜藏着一个大写的“人”,其在权力的施压下不断调整自身的模样,并最终服务于合法性的建构,那么事实则不归属于任何主体形式,它以客观而冰冷的面孔出场,在所有人的心中投射出近乎相同的图景。

概括而言,话语是隐性的,事实是显性的。话语往往躲在暗处,悄无声息地影响现实、重塑现实;事实则与现实如影随形,尝试勾勒出现实的本真状态。正因如此,作为现实的映射之“物”,事实更像是一种持平之论,不偏不倚,成为主体之间的对话“媒介”——正是在事实维度,修辞者与接受者的认识图像才得以重叠在一起,形成关于世界的共同理解和通用图像,而这正是邀请修辞竭力呼唤的框架悬置路径。因此,如何最大限度地呈现事实,以事实为基础打开对话的通路,并将事实认知与判断的权力完整地交给接受者,无疑是邀请修辞应该恪守的一种叙事理念。

(二)修辞论证视野中的事实

无论是传统修辞学,还是新修辞学,都赋予事实极为重要的理论“位置”,尝试在事实的基础上编织某种劝服或认同体系。事实在修辞学中的出场,主要围绕修辞论证(rhetorical argumentation)问题展开,其尝试回答的问题是:事实如何作为一种修辞资源,参与修辞活动的劝服实践?修辞论证意为借助一定的修辞手法来增强论证活动的说服力,以实现特定的修辞目的和功能。尽管修辞论证旨在制造一种“看上去如此”的表达或传播效果,但这并不意味着修辞活动对事实采取回避的态度,甚至与事实背道而驰;相反,传统修辞学和新修辞学都将事实整合

进修辞论证的知识视域，不遗余力地挖掘事实的论证潜能。

传统修辞学将事实视为一种重要的修辞论证资源，尝试通过对事实的选择、征用或修辞处理，形成劝说性的话语形式。首先，在论证推理层面，事实深度嵌入论证体系，并服务于论证活动的推理过程。亚理斯多德提出修辞论证的两种基本方式，即例证法和修辞式推论，前者主要体现为归纳法，后者主要体现为三段论法[18]24－26。这两者都赋予事实一定的修辞位置，强调事实之于论证的重要性——无论是例证法对事实的精心选择，还是三段论法对事实的高度依赖。其次，在修辞策略层面，传统修辞学给出了三种代表性的修辞策略，亦即亚理斯多德所说的三种“或然式证明”，分别是诉诸人格（ethos）、诉诸情感（pathos）和诉诸理性（logos）。其中，“诉诸理性”更是将事实纳入理性的逻辑轨道，认为事实及其真伪问题不仅是理性的构成部分，也是理性形成的推论基础。作为一种或然式证明方式，传统修辞学对事实的征用，往往是为了建构另一种推论式的现实，或者是“看上去如此”的现实。正是在修辞论证结构中，事实进入理性论证模型，成为不可或缺的修辞资源。正如亚理斯多德所说：“当我们采用适合于某一问题的说服方式来证明事情是真的或似乎是真的时候，说服力是从演说本身产生的。”[18]24 最后，在争议宣认层面，古希腊修辞学者赫尔玛格拉斯立足事实（fact）、定义（definition）、品质（quality）和程序（procedure）四大核心争议点，概括出修辞论证的四种争议宣认方式——事实宣认、定义宣认、品质宣认和程序宣认[19]77。概括而言，无论是在论证推理层面，还是在修辞策略层面，抑或是在争议宣认层面，事实从未成为修辞论证的“弃儿”，反倒作为一种重要的论证资源，积极参与传统修辞学的劝服实践。

新修辞学所强调的“同一”问题，亦未忽视事实维度的认同建构功能。为了建立修辞者与接受者之间的同一性，新修辞学发现了符号的象征能力，认为经由一定的象征化处理，事物超越了原始属性，并以象征为交换语言，展现出强大的认同潜力[20]。必须承认，象征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事实的“背叛”，因为其偏离了事物的本真状态，将接受者带入一个想象的世界，在那里完成象征意义的置换与生成。简言之，新修辞学试图构建的认同，并非来自对事实本身的认同，而是通过挖掘事物的象征意义，形成一种想象的认同。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新修辞学完全放弃了事实；相反，象征潜能的挖掘以及合法性建构，经常以事物的真实属性为修辞基础——象征性的发掘，并非立足事物的全部属性，而是依赖于对部分属性的选择与符号化处理。那些能够在接受者心中唤起认同的符号表达，或多或少地会与事实纠缠在一起，并以事实为感知或想象基础，建立一种象征意义，以此激起受众的些许触动和共鸣。纵观新修辞学的三种认同模式——情感认同、对立认同和误同，都存在一种基于事实的修辞面向，即在事实层面构建事物的象征性，打开意义的象征空间，以实现认同话语的隐性构建。具体而言，情感认同所依赖的故事资源往往具有现实原型，因为只有那些真实的事物才能激发普遍的共情；对立认同的本质是划定一种想象的群体边界，而现实中的事实（如地域、战争）无疑是共同体之边界想象的感知基础；误同之所以能够建构“虚幻的认同”，往往是因为其以现实为背景，制造了一种真实的“幻想之境”。

（三）事实何以参与“邀请”

面对主体意图对接受者的隐性压制，邀请修辞首先需要突破的问题是重构修辞者与受众之间的关系[21]。传统修辞实践往往存在框架先行的问题，受众被困于框架之中，只能获取被预先“封存”在框架装置中的意义。因此，框架悬置意味着为受众提供一个未经修辞雕饰的现实，使其根据文本中的情景、故事和线索，自由地调用认知框架，形成属于自我的认知意义。必须承认，传统修辞实践也会策略性地呈现事实，但事实往往承受着话语的操控、框架的裁剪、故事的摆布，并未真正停留在事实的领地，而是作为一种被征用的话语资源出场，服务于某种修辞框架的生产实践。例如，西方媒体关于中国人权、环境、军事、主权等议题的报道之所以存在诸多偏见，并非因为“事实”的全然缺席，而是因为事实是碎片化的事实，是剪辑后的事实，是被凝视的事实。这些所谓的“事实”沿着话语预设的方向被选择、被编辑、被组织，最终未能还原现实的真实图景，反倒成为西方话语的修辞资源。例如，在西方数据新闻的表征图景中，尽管新闻中的数据是真实的，具有可靠的来源，但是建立在数据类比、可视化基础上的“数据故事”往往重置了数据的语境，最终在西方话语的裹挟下，重复着那些老套的框架与偏见[22]390－403。

因此，邀请修辞所呼唤的框架悬置，意为回归事实“本位”，以事实为方法，实现传播者与接受者之间的平等对话与共同理解。这里的事实，既非框架的牵线木偶，也非框架的操控对象，而是允许接受者自主地进行意义建构，从而形成一种基于事实而非基

于框架的认知和判断。自媒体账号“呦呦鹿鸣”于2019年发布的新闻“爆款”《甘柴劣火》聚焦于媒体广泛报道的发生在甘肃武威市的一起腐败事件，通过整合其他媒体的相关报道，讲述了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尽管报道中呈现了大量的新闻事实，但这些事实并非来自记者的调查与采访，而是取材于其他媒体的先前报道。记者的报道工作主要体现为打捞事件的相关事实，选择和整合事实素材，以讲述一个极具戏剧性的新闻故事。尽管该报道将事实推向了新闻叙事的主体位置，但并未对框架进行悬置处理，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事实的出场方式是不明确的，也是有争议的，部分事实被标注了新闻来源，其他事实则被置于全知视角下直接使用。由此造成的关键性事实的语境缺失，既不利于现实本身的认知建构，也不利于事实框架的形成。另一方面，报道中充斥着大量的评论性内容，其功能便是预设一种统摄性的叙事框架，为事实的出场提供必要的“脉络”和“体系”，即按照戏剧性的内在要求将事实串联在一起，连点成线，织线成网，以形成一个悬念迭起的新闻故事。这些原本存在于其他报道中的事实，如同一枚枚信手拈来的棋子，被迫离开原有的存在语境，遵循媒介“爆款”的流量逻辑，进入故事的整体“布局”。显然，尽管事实占据了文本叙事的绝对分量，但该报道并未赋予事实以自我“言说”的论证空间，亦未赋予受众以自由认知和自主探索的意义空间。

之所以强调受众认知的自由性，是因为他们承受着来自修辞框架的压力。邀请修辞之“邀请”内涵，主要体现为对受众进行邀请，使其“进入修辞者的世界，并像修辞者那样看待世界”[5]。因此，以修辞的方式对修辞框架加以悬置，保障受众认知的自由性和平等性，既是邀请修辞的修辞目的之所在，也是框架悬置的实现路径。而要达到这一修辞目的，较为有效的“邀请”方式莫过于立足现实的本真状态，以促进理解和对话为修辞初衷，摈弃劝说的话语模式、先在的刻板印象和预设的价值立场，通过对多元事实的记录和呈现，建立一种基于事实框架的文本表征体系。在具体的邀请修辞实践中，尽管事实被推向了框架悬置的核心位置，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事实不假思索地进行堆积、排列与拼接，或是对事实进行流水账式的记录与呈现；相反，唯有将事实置于一种叙事的逻辑中，从叙事的维度思考事实所编织的现实图景、建立的平等关系、激活的对话空间，才能真正在文本维度实现框架悬置的邀请修辞目的。

三　主体意图的调适：框架干预与框架整合

框架是叙事者“施加”在文本中的符号装置，其内在的组织法则受制于修辞实践中的主体意图。因此，邀请修辞的难点在于认识和处理叙事意图的潜入问题。按照女性主义修辞的观点，传统修辞观念中的劝说本质上是一种暴力行为[23]。框架既是暴力施展的“帮凶”，也是暴力伪装的“据点”，它将主体意图隐匿在自身的装置结构中，以一种不在场的方式影响并诱发接受者的认知框架。如何避免叙事者的主体意图过度潜入文本内部，干预并主导故事的内容与表达，从而为接受者创设一个自由的、自主的认识空间？必须承认，文本生产是一个极具创造性的意义活动，主体意图的介入和渗透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修辞“基因”中的功能、目的和效果问题，原本就与主体意图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以至于文本意义的阐释往往需要诉诸主体意图，从那里获得阐释的线索和密码。

倘若主体意图无法从叙事中完全剥离出去，那便需要在叙事方式上采取“疏导”而非“堵截”的策略。一种行之有效的框架悬置路径是立足文本的传播情景和功能，对主体意图进行调适，从而实现修辞框架的悬置目的。调适，即是对主体意图的“输出”方式加以限制，既可以体现为一种干预和控制策略，也可以体现为一种对冲和制衡策略：前者具有主动“出击”之意，强调最大限度地控制主体意图在文本中的暴力入侵；后者具有防守“反击”之意，强调将作者意图和受众意图加以整合，以创设一个开放的文本空间。基于此，我们可以将框架悬置的叙事路径概括为两种方式：一是框架干预，二是框架整合。需要特别关注的是，修辞者与受众之间如何建立一种平等的交流关系？邀请修辞提出了三个基本前提，即安全、价值和自由[11]10−17。因此，主体意图的调适，并非对传者框架的肆意“魔改”，而是以创设安全的交流氛围、承认受众的内在尊严、确保个体的自由决策为基本遵循。

(一)框架干预与零度叙事

框架干预意为基于“零度叙事”理念，竭力淡化甚至抹去叙事者的出场痕迹，将叙事中的“发声”空间完整地让渡给现实本身的逻辑和过程，如完整记录事件的整个脉络，直观展示事物的原始状态，真实呈现故事的不同声音，等等。为了规避叙事者主体意志在文本中的隐性渗透，纪录片中的原生态风格、

新闻报道中的自述体风格等文体风格都最大限度地限制了叙事者的“发挥”空间，以此实现让事实“说话”的框架悬置目的。

本文将“零度叙事”作为邀请修辞的重要分析概念，主要的理论依据是修辞学中的“零度修辞”以及叙事学中的“零度写作”。这里的“零度”是一个关涉“区分”“比较”“临界”的概念，其反映的是修辞介入文本的程度与价态。零度修辞是比利时列日学派提出的修辞观念，其指向的是一种未经修辞打磨的文本形式。零度修辞的潜在假设是：修辞是对文本原意的一种遮蔽，当修辞从文本中离场时，原意才能显露出来。因此，零度修辞意味着一种通往文本原意的修辞实践。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中将修辞区分为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而零度正是二者的分界点：消极修辞是一种平实的表达，旨在使人“理会”；积极修辞是一种艺术的表达，旨在使人“感受”。尽管零度修辞体现的是一种处于零点状态的修辞，但陈望道依旧将其纳入消极修辞的范畴，视其为一种退却的、消极的修辞状态。陈望道并未否定消极修辞的功能和意义，但不可否认，他推崇的依旧是积极修辞，并坚定地认为积极修辞乃是真正的修辞[24]18。“零度”概念在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这里被进一步发展为“零度写作”，即一种中性的、客观的写作风格。零度写作之“零度”概念延续了巴尔特的符号思想内涵——零度并非虚无，而是有意义的缺席，“零度所显示的是所有符号系统以‘一无所言’来表达意义的能力”[25]72。在巴尔特看来，写作本身是特定社会目的驱使的语言实践[26]6，其风格与形式不仅受制于主体意图的创造方式，也受制于社会历史的总体法则。因此，绝对的零度写作是不现实的。零度风格并非无风格，而是指向一种去风格化的风格，即一种难以借助现有符号秩序和修辞语言加以分析的风格。巴尔特主要在形式与风格层面讨论零度与零度写作问题，但修辞学的实践取向决定了邀请修辞必然要回应修辞功能和意义问题。因此，本文讨论的零度叙事问题并非对“零度写作”概念的完全移植，而是借鉴“零度”的符号思想，旨在寻求一种有意义的框架缺席。显然，零度叙事并非一种无框架的修辞实践，而是强调将叙事者的主体意图限定在零度状态，避免其幻化为一种隐蔽的修辞框架。

概括而言，零度叙事意味着对附着在语言和符号之上的修辞、框架与话语进行积极的干预和控制，代之以事实为“零度世界”的语义秩序，以事实为认识和推理的认知框架，以此调适主体意图深层的修辞暴力。如果说修辞制造了现实的偏离或变奏，零度叙事则尝试回到现实本身，将修辞加诸现实之上的偏离或变奏“矫正”过来，以复原现实本来的“模样”，使受众在事实维度获得一定的认知自由。为了实现基于零度叙事的框架干预，客观上需要对叙事活动中修辞介入的方式进行限定和干预，常见的框架干预路径主要沿着两个维度展开：

一是伦理路径，即文本叙事要符合一定的伦理规范，以伦理为尺度，限定主体意图的肆意发挥。具体而言，一个事实的出场是为了讲述另一个更大的事实，因此不能将事实“降格”为一种简单的修辞资源，更不能对事实进行主观化裁剪、碎片化拼贴、戏剧化演绎、去语境化阐释等修辞处理。

二是文体路径，即以特定的文体风格和形式来规约主体意图的修辞渗透。如何实现零度写作？巴尔特意识到风格之于零度写作的辨别功能，认为零度写作具有明显的“零度”风格——只不过是一种无风格的风格而已。因此，风格既是零度写作的文体特征，也是零度写作的判断尺度。倘若一种写作在文体风格上体现出“零度”的形式与内涵，那便是一种零度写作。在巴尔特看来，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的《局外人》的自述风格，指向的是一种否定风格化的风格，即“一种‘不在’的风格”[26]36。在新闻叙事实践中，“自述体”风格便是零度叙事的常见风格，其显著特点是以当事人的自我叙述为报道主干，实现新闻故事的原生态讲述，以此干预叙事意图在框架维度的隐性渗透。相对于其他报道形式，自述体主要以人物自述为表达形式，通过“讲述自己的故事”来还原人物和事件的真实处境。2016 年，记者杜强的非虚构报道《太平洋大逃杀亲历者自述》真实还原了五年前“鲁荣渔 2682 号”渔船在智利附近海域作业期间发生的惨案。该报道制造了一起典型的“媒体事件”，仅在微信平台的阅读量便高达 3000 万次。2013 年 7 月，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 11 名被告人死刑、死缓、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后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5 名主犯死刑。这起事件迅速引发媒体关注，但报道内容多停留在法院披露的简讯层面，未能深入惨案发生的真实过程和细节。三年后，记者杜强得到一位刑满释放者的线索，在长达 20 多天的采访后，推出了这篇影响重大的非虚构报道。该报道在文体风格上以自述体的方式谋篇布局，体现了零度叙事的特征与风格：以第一人称视角讲述采访的前因后果，交代记者的写作初衷和背景；以采访对象的口述内容为报道主干，还原事件的完整过

程和细节;中间穿插记者的适当补充,以形成一个完整而连续的叙事。杜强也因为这篇报道获得第四届“人民文学之星”非虚构奖。

尽管零度叙事要求隐匿叙事者的主观意图,但这并不意味着否定叙事者在叙事活动中的创造性和能动性;相反,为了回到事实,并呈现一种极具张力的事实框架,叙事者恰恰需要在叙事方式上进行探索,以发掘一种有助于事实框架形成的理想形式。非虚构报道《太平洋大逃杀亲历者自述》中的自述内容占据了绝对篇幅,其表面上是对访谈内容的直接搬运,实际上却是基于这一事件之特殊性的巧妙选择——事件本身的“情节”已经充满戏剧性,可谓是悬念迭起、动人心弦,所以,最巧妙的故事“设计”莫过于本色“出演”。由此可见,零度叙事意味着一种叙事选择,亦代表一种叙事探索,其本质上是在寻求一种有效的叙事方式,以压缩乃至抹去主体意图的可能“嵌入”空间。实际上,尽管《太平洋大逃杀亲历者自述》大篇幅使用采访者的访谈内容,但记者并非深陷其中,而是在尊重事实逻辑的前提下积极探寻一切可能的故事化叙事手段。该报道总体上以采访对象的自述为内容主干,但记者在中间穿插的背景介绍中埋下了诸多悬念,如渔船出行之前,当采访对象提及厨师老夏时,记者在自述内容中间留下这样一个“包袱”:“本文作者在这里补充一个事实:后来替换上船的厨师老夏就成了第一个被杀的船员。”

(二)框架整合与开放叙事

在文本叙事实践中,除了在信息编码端进行框架干预,主体意图调适的另一路径是框架整合,其主要思路是对叙事者的传者框架和接受者的受众框架进行统合,即将受众框架纳入并整合进传者框架之中,以形成一种复调性的协作框架或共同框架,以此对冲、平衡或淡化传者框架对意义组织过程的绝对支配。框架整合的潜在逻辑是:由于文本生产过程牢牢地掌控在传者手中,加之框架生产本身又是一个极为隐蔽的符号过程,因此不能完全寄希望于修辞者的“自我悬置”;相反,倘若接受者的意图也同步“传导”至叙事者那里,并参与文本的叙事与生产过程,那最终呈现在文本中的框架,便不再是单一声音的独白,而是一种协作性的、对话性的复调。

从具体的传播实践来看,框架整合无疑是一种极具操作性和现实性的框架悬置路径。作为一种替代性的框架悬置方式,框架整合并非直接拒绝叙事者的主体意图,而是在承认传者框架的前提下,充分考虑受众的需求、立场、价值和行动,并将其同步纳入文本叙事与生产的各个环节之中,以此实现对传者框架的影响与调适。在跨文化传播实践中,由于文化“区间”的存在,刻板印象往往是一种挥之不去的传者框架。如何对传者框架进行对冲和制衡?一种行之有效的框架悬置方法便是保持叙事的开放性,鼓励“他者”参与到文本生产实践中,以形成一种协作叙事。当“他者”进入文本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并调和单一声音的构成、音调和旋律时,文化的“交集”便在被霸权话语遮蔽的凝视结构中显露出来[6]。

因此,框架调适意味着一种替代性的框架悬置方式,其区别于框架干预的显著特征是对传者框架进行“疏导”而非“堵截”——尤其是当“堵截”变得愈加艰难之际,退而寻求一种替代性的“干预”方式,无疑有助于拓展框架悬置的实践向度。常见的“疏导”思路是在承认作者框架的前提下,打开或拓展作者框架的开放性——将作者框架向受众敞开,允许并鼓励受众介入其中,从而将受众纳入“作者”序列,成为文本的“共同作者”,以此改变单一框架的支配模式,代之以一种复合型的框架形态。2014年,《南方周末》发起“回乡测水”行动,鼓励热心网友购买“我测我水”检测包,利用春节返乡机会,检测家乡河流的水质。根据网友上传的各地水质检测数据,《南方周末》推出新闻报道《“回乡测水”家乡水,清几许?》,绘制出全国的民间水质地图。区别于传统的新闻生产模式,该报道充分发掘社会力量,从公众那里获取报道的素材和数据,再经由记者的叙事整合与可视化呈现,呈现出一个由记者和公众共同完成的新闻故事。显然,该报道体现的是一种协作式的新闻生产模式,其有别于传统报道的显著特点便是受众进入新闻生产环节,成为文本的共同作者——来自受众的水质检测报告,构成了新闻报道的核心数据来源;受众构成的地域分布特点,揭示了民间水质状况的基本“地图”。在传统的报道模式中,记者一般需要奔赴全国各地进行实地调研,获取水质的监测数据,并形成新闻报道,但由于时间、精力、成本等因素的限制,记者一般只能选择一条或若干条河流样本或案例,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主题推演或总体预测。概括而言,传统报道将受众排除在传者框架之外,而修辞框架正是在这一封闭的叙事空间中被悄然生产出来的:一是对象选择维度的框架预设。任何一种选择,必然伴随着一种遮蔽。新闻选择往往会制造一定的选择偏见(selection bias)[27],而且这种偏见不仅发生在网络世界[28],其在图像世界亦是如此[29]。实际上,新闻选择本身意味着一种有目的的框架生产实践。哪条河流能够

进入记者的选择视野，往往与新闻报道的宣传导向和主题落点有关——舆论监督报道大多会选择污染较为严重的河流，其话语深处是责任框架或生命框架；正面报道往往会选择治理成效显著的河流，其背后潜藏的是领导框架或治理框架。二是逻辑推演维度的框架生产。新闻报道一般并不满足于个案呈现，而是尝试以个案为线索，在故事维度形成一个总体性的认识话语，如讲述一个道理，推演一个主题，做出一个预测。故事何以成为话语，往往离不开特定修辞框架的生产与再造。例如，环境议题中的情感叙事策略之一便是以生态故事为修辞对象，通过对情感框架的修辞建构，实现基于情感认同的生态话语建构[30]。

相较于传统修辞对传者框架之封闭性的刻意雕饰，邀请修辞所倡导的框架整合之本质是生产者将自己的作者框架让渡出来，使其从原始的封闭结构中走出来，保持一种开放的、透明的、浮动的状态，以接纳受众框架的闯入、校正与再造。当受众框架进入作者框架，并完成对作者框架的重构时，框架整合意味着一种替代性的框架悬置方案——只不过这里的悬置方式并非延续了传统意义上的零度叙事模式，而是通过对作者框架的对冲与重塑得以实现。正是在框架整合模式中，文本叙事中的作者框架改变了原初的模样，呈现出一副平和、包容、开放的姿态：这里不再是独白性声音的生产装置，也不是劝说性意图的藏身之所，更不是霸权性话语的伪装据点，邀请修辞所呼唤的平等关系、自由认知、共同理解等价值目标得以在一种透明的生成框架中显现出来。

不难发现，框架整合所体现的传者与受者之间的对话诉求，尤其是通过改写传者框架（改变传者）来重构意义系统（改变受众）的修辞观念，无疑是对邀请修辞之理论起点——萨莉·米勒·吉尔哈特（Sally Miler Gearhart）提出的“修辞的女性化”（womanization of rhetoric）观念的有力注解。面对弥漫在传统修辞学中的劝说暴力，吉尔哈特给出的“药方”是女性主义——正如男性改变世界的前提是改变自己，修辞学应该从女性主义那里寻求“改良”路径，如吸纳女性主义所主张的平等观念，赋予修辞对象一种平等的而非凝视的对话位置[23]。显然，框架整合的叙事本质是尊重受众，尊重主体之间的差异性，将受众框架吸纳到传者框架之中，“邀请”受众成为文本的共同作者，以此创设一种平等的对话关系。可见，对于邀请修辞备受诟病的“落地”问题，框架整合无疑提供了一种具有操作性和可行性的实践方案，即以框架为邀请修辞的操作对象，通过对框架的整合来实现框架悬置的目的。

如果说框架干预旨在基于零度叙事理念，从“源头”控制劝说性意图的直接“输出”，框架整合则意味着从叙事活动设计维度出发，在作者框架中引入受众框架，以多种声音之“复调”来代替一种声音之“独白”。因此，框架整合的叙事本质是开放叙事，即通过对受众参与方式的设计与创新，创设一个开放的、包容的、多元的叙事空间。从阐释学的角度来看，阐释的核心问题是文本的封闭性与开放性[31]。封闭性意为文本的意义空间是封闭的，是和谐的，是由作者主导的，阐释不过是对文本内部“预置”意义的攫取；开放性意为文本乃是一个开放的意义空间，是各种声音相遇并争夺的场域，而受众在文本面前拥有阐释的自主性和自由度。尽管叙事学和阐释学讨论的核心问题具有明显差异，但不可否认，叙事活动中的意义组织和讲述方式，必然会影响阐释活动中的意义解释方式。其实，叙事的开放性之本质在于框架的悬置方式及程度——框架是否悬置、如何悬置、悬置到何种程度等问题，这些都会影响意义空间的“打开方式”。在一个被修辞框架悄然“捆绑”的意义结构中，受众的阐释自由必然会大打折扣；与此同时，当受众在修辞框架的“束缚”下失去阐释的自由时，叙事者和接受者之间的平等关系也无从谈起。

从这个意义上讲，文本的开放性以及开放叙事是邀请修辞之框架悬置亟待正面回应的命题，而框架整合无疑意味着一种极为重要的开放叙事路径。叙事的开放性体现在不同维度，相应地也就构成了不同的框架整合模式，具体包括以下三个维度：一是叙事策划维度的开放叙事。邀请修辞将“倾听”视为一种重要的“邀请”理念[12]，在具体的“邀请”方案设计中，一种直接而有效的“倾听”方式便是将选题完整地或部分地交给受众，由受众来决定“讲述什么”。2013 年，CNN 专栏作者约翰·D.萨特（John D Sutter）发起了一个在线新闻项目“改变清单：我们应该报道什么”，其打出的口号是“这次由你来做 CNN 老板”。记者提供了备受关注的 20 个公共选题，然后交由公众进行网络投票，再选择票数前五的选题进行深度报道。二是叙事活动维度的开放叙事，即受众深度参与新闻生产过程，由此形成一种全新的叙事模式——协作叙事。纵观当前的众包新闻事件，受众除了参与选题策划，还积极参与新闻生产过程，如众包数据的收集和分析、报告撰写等工作，由此成为文本的共同作者。在众包新闻实践中，媒体机构将作者框架让渡出来，留给受众较为充分的“填

充”空间,以此实现叙事者与受众的“共同主体性”。其实,早期的电视问政、网络问政栏目就已经具备协作叙事的雏形。例如,由山东广播电视台推出的大型新闻问政栏目《问政山东》便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的策划思路。节目每期邀请一位政府部门主要负责人担任对话嘉宾,对公众提出的问题进行现场解答。显然,无论是访谈话题的确立,还是文本内容的形成,不仅取决于节目组的主题策划,也依赖于社会公众的问题关切——公众深度参与文本内容的模块构成,并且主导了文本叙事的结构与框架。当受众关切成为文本框架的一部分时,该栏目体现的是一种以“倾听”而非“灌输”为叙事特征的框架调适模式。三是叙事落点维度的开放叙事。倘若无法将受众纳入作者框架,一种替代性的框架整合思路便是对作者框架进行留白,创设一个开放性的故事结尾或问题空间,由受众根据自身情况进行判断,以此实现对受众的倾听和尊重。

四 邀请修辞与框架透明性问题

必须承认,文本无法完全摆脱框架而存在。所谓的框架悬置,并非对框架的绝对悬置,而是一种有限悬置——无论是框架干预,还是框架整合,本质上都是对框架的一种调适行为。尽管框架调适并未将框架从文本中完全剥离出去,但却达到了一定程度的悬置效果。在从“劝说”到“邀请”的漫漫长路上,这样的调适行为已是极为重要。调适,作为一种面向主体意图的制衡方法,有效地重置了初始设置,对冲了潜在霸权,调和了单一声音。实际上,无论是框架干预维度的零度叙事,还是框架整合维度的开放叙事,都依赖于叙事者对修辞框架的主动放弃以及对主体意图的自愿让渡。然而,所谓的放弃,并非全然放弃;所谓的让渡,亦体现为有限让渡。接踵而来的问题是:邀请修辞究竟是否落到实处,或者说产生了何种修辞效果,不仅取决于叙事者采取了何种框架悬置方式,也取决于的受众是否能够感知、认识并体验到被“邀请”的诚意。

当框架无法从文本中完全搁置时,框架悬置需要同步考虑的问题是框架透明性(framing transparency),即将框架形成的思路、方法和过程清晰地呈现给受众,以便于受众识别并洞悉文本生成的框架装置,进而从框架的束缚中挣脱出来,批判性地进行意义阐释。如果说修辞框架的生产是对接受者自由认知的一种压制和捆绑,那么在文本中同步呈现修辞框架的藏匿之“所”,交代修辞框架的生成机制和方法,无疑意味着一种替代性的框架悬置策略。在新闻实践中,透明性问题是一个备受关注的理论命题[32],其意为将新闻活动向外部行动者公开与开放,以便于公众对新闻进行监督,进而对新闻的真实性、客观性等价值要素进行核实。新闻透明性存在于不同的维度,如编辑室维度的透明性[33]、故事维度的透明性[34]、信息收集维度的透明性[35]、算法维度的透明性[36]等等。新闻透明性必然会影响框架透明性——框架之所以呈现出某种不透明状态,往往是因为新闻生产与叙事过程存在不透明性。

由于受众面对的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文本“成品”,叙事者的主体意图是不在场的,编码过程亦是难以考据的,因此,框架之于接受者而言往往存在一定的不透明性。倘若事实脱离了真实的发生语境,或者承受着霸权话语的肆意摆布,甚至遭遇了修辞者的暗中裁剪,那这种“看上去如此”的现实,反倒会将受众带入更为隐蔽的“劝服”深渊而非自由的“邀请”空间。因此,框架透明性意味着框架的“去黑箱化”,即对隐匿在文本中的框架进行描边,勾勒出框架存在及发生作用的缘起、线索、踪迹和脉络,使其从黑暗状态进入透明状态,最终在文本中显露出来。简言之,框架隐匿在文本深处,唯有对其进行透明化处理,受众才能平等地站在叙事者的对面,自由地选择自己的认知框架,形成自己的阐释意义。因此,邀请修辞所呼唤的平等关系,需要从框架那里寻求突破:只有文本形成的组织法则及其修辞装置——框架对接受者是公开的,是透明的,是不设防的,那么叙事者与接受者之间的关系才体现为一种真正的平等关系。

在不同的叙事观念和实践那里,框架透明性的内涵实现方式是不同的。相较于传统的媒介叙事,数字叙事的框架透明性是一个亟待探索的新命题。数字叙事所依托的程序、装置、算法往往隐匿在文本深处,它们并未直接显现于文本的表征世界,而是通过对叙事规则的设定,深刻地影响着框架的生成模式。经由数字装置的程序化“封装”,主题意图被伪装成一定的信息模式,潜伏在看似中立、客观、冰冷的技术“外衣”之下,以一种更加隐蔽的方式作用于修辞框架的建构。如果说传统叙事的框架生成过程更多地依赖于叙事本身的修辞语言,数字叙事则转向一种复合型的框架生成模式——文本框架的形成,沿着文本表征和程序规则两个维度同步展开,最终在与受众的相遇中“汇流”。比如,互动装置表面

上赋予受众一定的参与空间,为受众创设了自由探索的可能世界(possible world),但实际上通过对“游戏规则”的控制与设定,制造了一种“自由的幻象”。随着人工智能广泛应用于叙事实践,叙事者和接受者之间的不对称性、不平衡性进一步加剧——叙事者通过对技术装置的使用与配置,往往拥有更大的“自我赋权”能力。当前较为流行的新闻游戏(news game)往往携带着明确的主题宣传、公共教育、知识传播目的,只不过游戏中的叙事框架并非静静地寄居在文本的表征世界,等待用户的认领,而是存在于程序修辞之中,铺设了叙事行为的元框架。

举例而言,作为数字时代的新兴新闻形式,融合新闻的叙事过程越来越多地诉诸数据、互动、程序、可视化、智能生成等。然而,由于生产过程往往是不透明的,受众难以识别出文本内部的框架形态,也难以从文本内部获得框架形成的破译线索或密码。具体而言,数据维度的可靠性、互动维度的游戏法则、程序维度的设计规则、可视化维度的视觉修辞、智能生成维度的算法偏见等问题都会悄然作用于修辞框架的生成,这无疑加剧了框架的透明性危机。因此,除了面向主体意图的框架调试,框架悬置亟须从“结果透明”转向“过程透明”,即最大限度地公开“暗箱”世界的游戏法则,便于受众清晰地识别文本框架的形态、语言及生成方式,批判性地审视“封装”在框架内部的意义和意图,从而实现自由认知的邀请修辞目的。澎湃新闻于 2023 年推出的数据新闻《一票难求的上影节,近十年怎样走过?》,并未掩盖记者的叙事意图,而是明确交代文本的具体生产方式,包括人机之间的“沟通”过程,从而以“过程透明”来实现“框架透明”。具体而言,该报道是在人工智能全程辅助下完成的一则数据新闻,记者首先利用 ChatGPT 抓取和分析上海电影节十年间的网络数据,然后借助 WebPilot、Show Me 等插件进行可视化处理,最终将这些数据整合到相应的叙事模块。在该报道的结尾,记者附上了相对完整的“后记”,交代了整篇报道的数据来源、制作思路、数据处理方法,尤其是与 ChatGPT“交流”过程中的“心路历程”。尽管该报道通过对文本框架的建构,揭示了上影节十年来的诸多变化,但这些“发现”并非单一声音的自我“输出”,而是一种可溯源、可验证、可辩驳的对话性事实和话语,因而体现出邀请修辞的价值立场。由此可见,由于叙事活动中的框架意味着一种遮蔽或凸显,那么,对框架进行透明化处理,则意味着将框架向受众敞开,便于受众有意识地发现并辨析框架的遮蔽或凸显之“物”。

因此,框架透明性并非否定框架存在的合理性,而是要回答这样一个根本性的修辞伦理或修辞规范命题:正视并交代框架的合法出场问题,如框架从哪里来,寄居在何处,征用了何种修辞装置,受制于何种意图的驱使,依赖于何种程序规则,以何种方式发挥作用,在何种“素材”基础上建造而成,等等。可见,框架透明性赋予了框架悬置一种伦理规制,使得框架以一种替代性的方式被悬置。具体而言,面对既定的传播语境及其功能逻辑,既然主体意图不可避免地存在并发生作用,那么不妨转向另一种“悬置”思路,即主动“暴露”主体意图发生作用的框架装置,便于受众清晰地识别框架,发现那些被框架遮蔽的素材和意图,从而对潜藏在框架中的劝说保持足够的警惕和批判,以避免单一声音或霸权话语“借道”框架装置发生作用。

概括而言,框架透明性客观上要求呈现一个没有盲区的文本空间,使得受众可以自由地穿行其中,不仅拥有自主的认识潜能,而且拥有自由的批判能力。当框架在刻意凸显、强化某些内容时,其他内容也被同步遮蔽了,而框架透明性则要求复活框架之外的世界,即通过呈现框架出场的原因、过程与痕迹,帮助受众识别和发现那个被框架遮蔽的修辞世界。因此,除了对框架进行必要的干预和整合,还有一种替代性的框架悬置模式,那便是回到框架的出场问题,将框架置于阳光之下,使其接受受众的监督与批判,而这无疑是一个有待深入探讨的邀请修辞命题。

[参　考　文　献]

[1] Delia J G.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 history[M]//Berger C R, Chaffee S H. Handbook of communication science. Newbury Park, CA: Sage, 1987: 20-98.

[2] Bryant D C. Rhetoric: its functions and its scope[J].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1953(4): 401-424.

[3] 刘涛. 传播修辞学的问题域及其研究范式[J]. 南京社会科学, 2022(1): 91-105.

[4] McCroskey J C. An introduction to rhetorical communication[M]. 9th ed. London: Routledge, 2016.

[5] Foss S K, Griffin C L. Beyond persuasion: a proposal for an invitational rhetoric[J]. Communications Monographs, 1995(1): 2-18.

[6] 刘涛. 基于情景的对话:邀请修辞与跨文化沟通的修辞实践[J]. 跨文化传播研究, 2023(2): 81-102.

[7] Goffman E. Frame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M]. Boston，MA：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1974.

[8] 莱考夫. 别想那只大象[M]. 闾佳，译.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9] Gamson W A，Lasch K E.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social welfare policy[M]//Spiro S E，Yuchtman-Yaar E. Evaluating the welfare state：social and political perspectives. New York：Academic Press，1983：397－415.

[10] Gamson W A ，Modigliani A. Media discourse and public opinion on nuclear power：a constructionist approach[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89(1)：1－37.

[11] Foss S K，Foss K A. Inviting transformation：presentational speaking for a changing world[M]. 3rd ed. Long Grove，IL：Waveland Press，2012.

[12] DeLaure M B. Planting seeds of change：Ella Baker's radical rhetoric[J]. Women's Studies in Communication，2008(1)：1－28.

[13] Scheufele D A. Framing as a theory of media effects[J].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999(1)：103－122.

[14] 刘涛. 视觉修辞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

[15] 刘涛. 新概念 新范畴 新表述：对外话语体系创新的修辞学观念与路径[J]. 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2)：6－19＋126.

[16] 鲍曼. 想象与修辞幻象：社会现实的修辞批评[M]//宁，等. 当代西方修辞学：批评模式与方法. 常昌富，顾宝桐，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78－93.

[17] Entman R M. Framing bias：media in the distribution of power[J].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07(1)：163－173.

[18] 亚理斯多德. 修辞学[M]. 罗念生，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19] 刘亚猛. 西方修辞学史[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

[20] 博克. 修辞情景[M]//博克，等. 当代西方修辞学：演讲与话语批评. 常昌富，顾宝桐，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55－168.

[21] Makau J M. Notes on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and social justice[J]. Communication Studies，1996(1/2)：135－141.

[22] 刘涛. 融合新闻叙事：故事、语言与修辞[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

[23] Gearhart S M. The womanization of rhetoric[J].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Quarterly，1979(2)：195－201.

[24] 陈望道. 修辞学发凡[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25] 巴尔特. 符号学原理[M]. 王东亮，等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26] 巴尔特. 写作的零度[M]. 李幼蒸，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27] Kozman C，Melki J. Selection bias of news on social media：the role of selective sharing and avoidance during the lebanon uprising[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22(16)：2864－2884.

[28] Van der Meer T G L A，Hameleers M，Kroon A C. Crafting our own biased media diets：the effects of confirmation，source，and negativity bias on selective attendance to online news[J]. 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2020(6)：937－967.

[29] McCarthy J D，McPhail C，Smith J. Images of protest：dimensions of selection bias in media coverage of Washington demonstrations，1982 and 1991[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96(3)：478－499.

[30] 刘涛，刘倩欣. 情感叙事：环境传播的公共修辞实践[J]. 新闻界，2023(4)：4－20.

[31] 顾明栋. 为何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论诠释的开放性与文本表意逻辑[J]. 文艺理论研究，2022(3)：80－89.

[32] Phillips A. Transparency and the new ethics of journalism[J]. Journalism Practice，2010(3)：373－382.

[33] Chadha K，Koliska M. Newsrooms and transparency in the digital age[J]. Journalism Practice，2015(2)：215－229.

[34] Masullo G M，Curry A L，Whipple K N，et al. The story behind the story：examining transparency about the journalistic process and news outlet credibility[J]. Journalism Practice，2022(7)：1287－1305.

[35] Rupar V. How did you find that out? Transparency of the newsgathering process and the meaning of news：a case study of New Zealand journalism[J]. Journalism Studies，2006(1)：127－143.

[36] Diakopoulos N，Koliska M. Algorithmic transparency in the news media[J]. Digital Journalism，2017(7)：809－828.